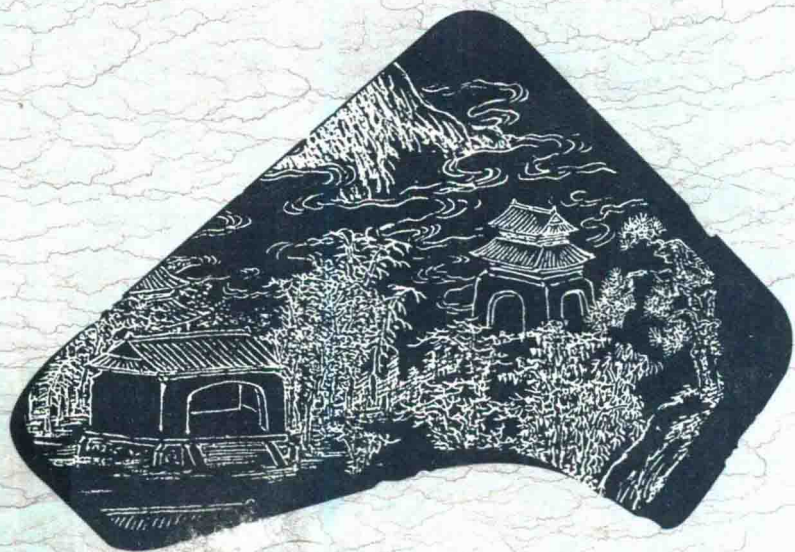


南京稀见文献丛刊

金陵梵刹志 (上)

(明) 葛寅亮 撰



南京稀见文献丛刊

金陵梵刹志(上)

(明)葛寅吉

点校 何孝荣
审校 濮小南

南京出版社

《南京稀见文献丛刊》学术顾问

茅家琦 蒋赞初 梁白泉

《南京稀见文献丛刊》编委会

主	任	朱同芳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振明	卢海鸣	朱同芳
		吴小铁	何孝荣	詹天灵
		濮小南		
丛 书 主 编		朱同芳		
执 行 主 编		卢海鸣		

总 序

南京是我国著名的七大古都之一,又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 24 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将近 2500 年的建城史,1700 年的建都史,号称“六朝古都”、“十朝故都”。南京的地方文献是中华历史文化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风民俗的重要资料。按照南京市委、市政府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的要求,配合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深度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做好历史文献整理出版工作,不仅有利于传承、弘扬南京历史文化,提升南京品位,扩大南京知名度,也有利于当前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

长期以来,南京地方文献还没有系统地整理出版过,大量的南京珍贵文献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和民间。许多珍贵的南京文献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有的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湮没无闻。广大读者想要查找阅读这些散见的地方文献,费时费力,十分不便。为开发和利用好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瑰宝,充分发挥其资治、存史、教化、育人功能,南京出版社组织了一批专家和相关人员,致力于搜集整理出版南京历史上稀有的、珍贵的经典文献,并把《南京稀见文献丛

刊》精心打造成古都南京的文化品牌和特色名片。为此，我们在内容定位上是全方位、多视角地展示南京文化的深层内涵和丰富魅力；在读者定位上是广大知识分子、各级党政干部以及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在价值定位上，丛书兼顾学术研究、知识普及这两者的价值。这套丛书的版本力求是国内最早最好的版本，点校者力求是南京地方文化方面的专家学者，在装帧设计印刷上也力求高质量。

总之，我们力图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扩大稀见文献的流传范围，让更多的读者能够阅读到这些文献；增加稀见文献的存世数量，保存稀见文献；提升稀见文献的地位，突显稀见文献所具有的正史史料所没有的价值。

《南京稀见文献丛刊》编委会

导 读

—

《金陵梵刹志》五十三卷，明葛寅亮撰。葛寅亮（1570～1646），字水鉴，号岷瞻，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父大成，任福建崇安县（今武夷山市）丞，寅亮随至闽，读书武夷山中。万历二十八年（1600），中浙江乡试第一。次年，成进士，授南京礼部仪制司主事，迁祠祭司郎中。寅亮在任，日夕遵章守制，勤于职守。他为“靖难”后不肯降附的“殉国名臣”平反昭雪，疏请修建黄观、方孝孺祠；将被罚入乐籍的牛景先后人给照除名，复姓从良；他又为南京诸佛寺“厘飭僧规，清复赐租，修葺禅宇”，对南京佛教加以改革。寻告归，筑室南屏山麓，讲学西湖南之萧寺，从游者多四方名士。

万历三十九年，起为江西右参议，兵备九江。九江税使李道恣意盘剥商民，势焰猖獗，地方官员惧而莫敢问。寅亮至，即张榜公布其弊蠹，并条列关则条款，檄李道遵行；执其帮凶打手，首恶论罪，分谨守规矩者百余人为二拨，轮流执勤，使听令约束，李道势焰始稍收敛。次年，当地饥，寅亮出三府公费数百金，并贷关使者千金，遣官告余湖襄，以平价粟。他又创建书院、社学，倡兴教育；开城门，筑堤建桥，设闸

浚塘。升参政，既而，因疾去，行李一肩而已。

万历四十四年三月，起为湖广提学副使。杜绝请谒，所至与诸生讲学不倦。拔诸生必覆试，虑童生有遗珠，复令司理简阅，称名督学。性耿直，不愿考试作弊，得罪大僚。四十六年十月，遭降级。寅亮以病为由，挂冠而去。仍讲学湖南，从游者日益众。

天启元年(1621)六月，刑部侍郎邹元标疏荐寅亮，称其为济世长才，不宜长困林皋。二年四月，升任左都御史的邹元标再次疏荐寅亮，并称近年以京察锢人，正直官员多以朋党遭黜。寅亮感激邹元标疏荐，但回书否认自己因朋党而被斥。五月，寅亮降为福建按察僉事，分司水利道。他廉洁无私，竭力职事，不避劳远。疏浚省会内河，人称葛公河。参与驱逐荷兰殖民者侵占澎湖岛的战斗，立下功劳。五年六月，升为湖广布政司右参议，兵巡荆南道。寻降为湖广按察僉事。五年九月，升为福建布政使司右参议，管屯盐事务。后转提学。公明严正，品题允当，私寔尽绝。

天启六年十月，升南京尚宝司卿。崇祯元年(1628)正月，上疏抨击权阉魏忠贤擅政以来，朝中升、荫、加衔官泛滥，成规大坏，奏准厘其尤甚者。寻又告去。崇祯四年七月，起尚宝司卿。典试山西，与分考者约，互相简阅，期于必得。五年四月，受命册封衡王。七年九月，为左通政。针对当时各地农民起义蜂起，国库空虚，官军疲败，时人杨光先疏请设练总，并向百姓加派赋税，以充练饷。寅亮以民困苦，驳疏不

上。至九年七月，病归。光先复上前疏，寅亮因此被逮下狱。十二年，始获释。

崇祯十七年三月，腐朽的明王朝统治被李自成农民起义推翻，清军入关，占据北京，开始了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五月，明朝残余势力在南京拥立福王继位，建立南明弘光政权。九月，弘光朝起寅亮为太常寺卿。十二月，寅亮相见。弘光元年（1645，清顺治二年）正月，转大理寺卿。寅亮上疏指斥朝廷内外贪贿成风，要求惩贪奖廉。但弘光政权由权奸马士英等把持，内部纷争严重，政以贿成，寅亮之疏根本不能落实。转户部侍郎。五月，清军攻克南京，弘光政权灭亡。

寅亮赴福建，继续参加抗清斗争。七月，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立南明隆武政权，寅亮任工部侍郎。隆武二年（1646，清顺治三年）四月，疏言务去饰治繁文，必收近取实局。唐王目为老成格言，书铭座右。后晋升尚书。八月，因大将郑芝龙降清，隆武政权随之灭亡。寅亮忧愤成疾，绝食而卒，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其妾胡氏扶柩归西湖，后葬三台山。

寅亮著述较多，据其门人张右民称，有《四书湖南讲》行于世，《易系辞讲》、《治安策》、《仕学录》、《造适集》、《莞尔集》藏于家。民国《杭州府志》记载，还有《金陵梵刹志》、《诸子纂》、《葛司农遗集》。此外，《金陵玄观志》十三卷，亦为寅亮所撰。

二

葛寅亮虽以儒学安身立命，由科举而出仕，为官数载，归

隐林下，又讲儒学（主要是陆王心学）于西湖之南，却也信奉佛教。

他曾为杭州六通律寺山门题“法地重开”额、净明院题寺额，为《崇祯十五年云栖寺免差役碑》篆额。他的有关佛教、佛寺的撰著，除《金陵梵刹志》外，还有《永明塔院田记》、《重修普光院记》、《海宁放生池记》、《礼（黄山）莲花峰三禅院记》等。江西僧广聪筑弥陀庵于掷笔峰下，潜修不出，寅亮为易庵名为火莲院。杭州南屏山净慈寺建永明塔院，万历三十八年（1610）十月，寅亮置到柴山五段，共十一亩七分，施舍于塔院。名僧株宏演《圆觉》于净慈寺，寅亮等与会。万历四十二年三月，寅亮又买到邵秀荡六分七厘有奇，扩展该寺放生池，为株宏八十寿庆。而据时人所撰株宏传记、塔铭序记载，葛寅亮是株宏的具戒弟子。杭州湖心寺放生池，葛寅亮也是“现宰官身说法，为之护持者”之一。万历四十八年，为母报恩，他甚至舍宅建寺，名普度亲庵。

寅亮任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时，南京佛寺中制度涣散，寺田流失，佛寺萧条。寅亮信佛奉佛教，南京佛教、佛寺之事又正是其主管诸务中的一项。于是，他发心振救，着意改革。他将具备规模的佛寺按照“就近”原则，分为大、次大、中、小几种类型，以大寺统次大寺、中寺，次大寺、中寺统小寺，实行严格统属管理。他清田定租，佛寺赐田久夺于豪右者，皆悉力复之，并拘集佃户确定寺田租额。他主持订立佛寺各项制度，包括行政管理制度、经济管理制度、教育制度

等。为了巩固和记录改革成果，他编集了《金陵梵刹志》，传于后世。葛寅亮在南京的佛教改革，是以南京礼部名义推行的自上而下的佛教改革，在当时规模最大，措施最为详备。葛寅亮的改革，使南京佛教得到一定程度的振兴，成为全国样板。葛寅亮因此得罪势豪权宦，竟遭辱罢官，其改革亦告失败。

三

《金陵梵刹志》不仅详细地记载了明代南京各佛寺的历史沿革、殿堂分布、房田公产、山水古迹、名僧事迹、寺租赋税、僧规制度等，卷首二卷《御制集》、《钦录集》还收录了明太祖的佛学论文、明代诸帝有关佛教的诏敕法令等，是一部十分难得的明代佛教史著作，对明代佛教史、明代史以及南京佛教史的研究乃至今天的南京城市建设、旅游开发以及佛教界等均有重要价值。具体地说：

首先，它对研究明代佛教史、明代史等有重要价值。

清人编《四库全书总目》，批评《金陵梵刹志》“略如志乘之体，编次颇伤芜杂”。这种批评，今天看来，是十分偏颇的。《金陵梵刹志》仿杨銍之《洛阳伽蓝记》而体裁不同，不仅述雄观，亦兼述祠政，虽然超出传统的志书体例，却为我们今天留下了许多十分难得的史料。

例如，该书卷一《御制集》收录的明太祖佛学论文、诗文近八十篇，最为齐全。该书卷二《钦录集》，收录明代诸帝有关佛教的诏敕法令等。其中，洪武年间设立僧道衙门的法

令、整顿佛教的《申明佛教榜册》、僧人《避趋条例》等，均为原文收录。关于洪武年间僧、道录司的设立，《明太祖实录》、《大明会典》等几乎所有的明代官私史籍，都记载为洪武十五年(1382)四月设立，并颁布相关条例。而据《钦录集》的史料得知，僧、道录司的设立，是在十四年六月提出条例方案，至次年四月除授各官，并公布十四年六月拟定的条例的。明末释幻轮编撰《释鉴稽古略续集》，即抄录该文件。《申明佛教榜册》、《避趋条例》等，也赖该书得以保存。这些，对研究明太祖的佛教政策、研究明太祖个人极具价值。而我们知道，明太祖的佛教政策是明朝佛教政策的基础，它对明代乃至清代以来的中国佛教具有决定性影响。近世以来僧人分为禅、讲、瑜伽三类，而以瑜伽僧(为人作法事的僧人)独盛的中国佛教格局，即来自于明太祖确立的佛教政策的影响。

再如，该书卷二《钦录集》收录明成祖对编辑、校勘大藏经的多次谈话，他下令焚毁道教伪经《太上实录》，声言“我敬佛，他谤佛，留了我心不喜”，活泼而生动，显示了明成祖对编校大藏经的关心和直接掌握，昭示出他对佛教的崇奉态度。成祖以“靖难”夺得帝位后，以徐皇后的名义，伪造《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二卷，藉以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造反、夺位的“合法性”。但是，当僧一如等要求将该伪经编入大藏经时，明成祖却表示：“荒唐之言，不要入。”看来，明成祖也明白，假的终究不能当真。永乐十七年(1419)二月，成祖命僧一如、思扩等“为朕编类禅宗语录来看”。当

僧人题奏“中间合无去取”时，奉圣旨：“祖师说的都是佛法，不要去取。”又与他对《第一希有大功德经》的态度截然不同。这些史料，连《释鉴稽古略续集》都没有录入，对我们研究明成祖无疑十分珍贵。

再如，关于明代佛寺经济，各种方志、寺院志乃至四部文献中很少记载，而《金陵梵刹志》则在记载南京一百八十余所佛寺时，详列各寺土地数量、寺田经营、房产商业等，并附录有数篇寺田租税的判决文书，为我们提供出极为珍贵的明代佛寺经济的史料，其价值不言而喻。

再如，《金陵梵刹志》记载了葛寅亮等人订立的佛寺内部的一些管理制度，包括僧官的迁补、住持的选任等寺政管理制度，公产、公田、公费等佛寺经济管理制度，以及寺学等佛寺教育管理制度，使南京佛寺在当时成为管理制度健全的样板。这些史料，也为它书所无，它对于我们研究明代佛教、明代历史无疑具有很高的价值。

其次，它对研究南京佛教史具有重要价值。

提起历史上的南京佛教，相信每个人都会吟诵起杜牧的千古名篇《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南京，南朝时各朝先后建都于此，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南京佛教盛极一时，成为全国重要的佛教中心，佛寺多达 700 余所，“南朝四百八十寺”为当时南京佛教、佛寺繁盛的形象说法。南朝以后，南京政治地位下降，佛教时有兴盛，断续发展。到

了明代，南京先后作为首都和留都，政治地位提高，再次成为全国的重要佛教中心，佛寺大量修建，为南朝以后又一高峰。记载南京佛教、佛寺的撰著，在明朝以前，主要有唐释清澈著《金陵寺塔记》三十六卷，唐释灵祐著《摄山栖霞寺记》一卷。但是，二书问世后不久皆亡佚，“第名载于史志耳”，遂使四百八十四之盛，考证无据。葛寅亮则通过广征博考，搜罗经史子集四部之文，考订当时各寺以及一些历史上有影响而当时已经废毁的佛寺的历史变迁、典故、名僧、艺文，为后人了解、研究明代以前南京佛教、佛寺提供了便利。其后，清人刘世珩撰《南朝寺考》，即经常引用《金陵梵刹志》。《金陵梵刹志》也成为后来编修的南京各寺志的“依据”。如清人陈毅撰《栖霞寺志》，释德铠撰、谢元福增辑《灵谷禅林志》，记述明代及其以前栖霞寺、灵谷寺的殿堂、公产等情况，以及收录的诗文，即基本抄自《金陵梵刹志》，甚至沿袭其诗文排列顺序、题目改换及字句错误。

《金陵梵刹志》记载登录明代南京各寺的位置、殿堂、基址四至、公产乃至各种条例，多来自于实地调查、各寺报告，主要是第一手资料。其对明代尤其是明代后期南京佛寺方方面面的记载，更为真实可信，其价值自然更高。后人论述、提及明代南京佛教和佛寺，舍该书而无能为也。

第三，《金陵梵刹志》明确记载明代南京各寺寺址四至，尽列各寺之雄观胜景，也对今天的南京城市建设、旅游开发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富于现实意义。最显著的事例，就是如

今大报恩寺及琉璃塔的复建。大报恩寺起于晋朝长干寺，宋朝改名天禧。明初洪武年间，天禧寺与灵谷寺、天界寺、能仁寺、鸡鸣寺并称国家五大寺。永乐初，寺毁。明成祖为所谓报答“皇考、皇妣”即明太祖、马皇后“罔极之恩”，以及“下为天下生民祈福”，下令重建，赐名大报恩寺（一说明成祖建大报恩寺实为纪念其生母硕妃，大报恩寺大雄宝殿即俗称硕妃殿）。大报恩寺“梵宇皆准大内式”，与灵谷寺、天界寺并称为南京三大寺，僧众产饶。寺中“十宗兼备，每宗设一讲座，学僧得任择一宗修习”，是明代南京最大的讲寺，晚明四大师之一的憨山德清及名僧雪浪洪恩均出于该寺。尤其是其中的琉璃塔，规模雄丽，开创了中国琉璃塔的先河，是我国古代建筑琉璃艺术的最高成就。永乐时，海外使臣“至者百有余国，见报恩塔，必顶礼赞叹而去，谓四大部洲所无也”，被称为“中古时期世界七大奇观之一”。至十八世纪，西方人游南京，仍称之为“南京之表征”。但是，咸丰年间，寺塔毁于兵火，无复存焉。

近期，南京市决定复建大报恩寺及琉璃塔。除了考古发掘以外，重建的主要依据即是文献记载资料。民国时人张惠衣曾编《金陵大报恩寺塔志》，然其中明代大报恩寺、琉璃塔的修建敕令、丈尺高度、殿堂公产、碑记游记等第一手的数据资料，以及明代以前该寺资料等，基本抄自《金陵梵刹志》，甚至沿袭其个别舛误。对于如今希望“原汁原味”的复建来说，《金陵梵刹志》卷2不厌其烦地罗列出大报恩寺各处殿堂、琉

璃塔的丈尺高度等数据,这是当时南京各佛寺包括皇帝敕建佛寺中唯一“享此殊荣者”;卷31《聚宝山报恩寺》极为详细地介绍了大报恩各殿堂名称、位置排列、楹间数目、基址四至,还附有报恩寺寺图,完整直观地呈现出昔日大报恩寺、琉璃塔的雄观伟姿,并收录明人陈沂《琉璃塔记》、王世贞《游报恩寺塔记略》、《报恩寺塔歌》等文人墨客的踏勘游记,这些恐怕远非考古发掘所能获得和解决,弥足珍贵。《金陵梵刹志》的相关记载和第一手资料,无疑是大报恩寺及琉璃塔复建的主要依据。我们相信,大报恩寺、琉璃塔的复建,必将对南京城市建设、旅游开发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另外,对于南京佛教乃至中国佛教界,《金陵梵刹志》的相关记载,如其中的各种管理制度等,也不无借鉴意义。

四

万历年间,葛寅亮任南京礼部祠祭司郎中时,编撰《金陵梵刹志》。万历三十五年(1607)正月,该书“发南京僧录司刊”。不久,他“适请告去”,即遭辱告归。天启年间,寅亮复来,任南京尚宝司卿,为《金陵梵刹志》补序而复刊行。民国二十五年(1936),镇江金山江天寺僧释惟光以所藏天启补刻本,命人配补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又取明代集部钞补校勘,在上海影印出版。现在常见的有1980年台湾明文书局出版“中国佛寺史志汇刊”本,1996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中国佛寺志丛刊”本,1997年齐鲁书社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续修四库全书”本

等，皆据民国校勘本影印。

《金陵梵刹志》的卷数，此前记载歧异较大。或说为四十余卷。《客座赘语》记载：“祠部郎葛公所著《金陵梵刹志》四十余卷，一时大小寺院亡不详载”。或说为五十卷。清人钱曾《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录》记载：“《金陵梵刹志》五十卷，八本。”或说为五十二卷。明朝祁承燾《澹生堂藏书目》记载：“《金陵梵刹志》五十二卷，十四册。”《明史》记载：“葛寅亮《金陵梵刹志》，五十二卷。”此外，清代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雍正《浙江通志》、民国《杭州府志》也均作“五十二卷”。而《四库全书总目》、清人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丁仁《八千卷楼书目》、徐乾学《传是楼书目》、嵇璜《续文献通考》著录该书，均作五十三卷。葛寅亮在本书序中也明言：“乃为作《梵刹志》，奉《御制》、《钦录》二集弁之简前，遵王章也；……而一、二寺规之条列，则附之简末，为卷共五十有三焉。”可见，该书实为五十三卷，估计四十余卷、五十卷、五十二卷或为残本，或为大概说法。

《金陵梵刹志》万历初刻本已不易见，天津图书馆藏有《金陵梵刹志》天启补刻本（卷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为抄配）。与民国校勘本对校，天启补刻本还有诸多异处：（1）卷首葛寅亮《序》后缺“葛寅亮印”、“庚子解元辛丑进士”印两方；（2）《目录》后缺“南京礼部祠祭司郎中钱塘葛寅亮编辑，……管板僧银二分，共银二钱二分五厘”等文字；（3）卷33弘觉寺插图被错置于卷32能仁寺插图后、能仁寺介绍前，而非